

逃避自由

[德]埃里希·弗罗姆 著
陈学明 译 周洪林 校



· 工人出版社

[德]埃里希·弗罗姆 著
陈学明 译 周洪林 校

逃 避 自 由

E. Fromm

020611

目 录

译 序	1
前 言	10
第一章 自由——心理学上的问题吗?	14
第二章 个人的脱颖而出和自由的模棱两可	39
第三章 宗教改革时期的自由	60
中世纪的背景和文艺复兴运动	
宗教改革时期	
第四章 现代人自由的两个方面	140
第五章 逃避的心理机制	181
极权主义	

1-1-1

	破坏性	
	机械地自动适应	
第六章	纳粹主义心理学	273
第七章	自由与民主	310
	个人的幻觉	
	自由和自发	
附录	性格和社会过程	357

译 序

自古罗马至今数千年来，
无论哲学、政治、经济、
思想、文化等领域，自由始终是
人们所普遍关注的问题。特别是
近几百年来，“自由、平等、博
爱”，成为资产阶级长期为之浴
血奋战的口号。“不自由，毋宁
死”，“生命诚宝贵，爱情价更
高；若为自由故，二者皆可抛”，
更把自由当作比人本身存在的生
命、比在物质与精神完美结合上
的爱情还要珍贵的东西。在当
代，自由已经载入许多国家的法
律条款之中。许多社会问题，特
别是思想、文化、精神生活方面，
常常直接或间接与自由有关。既

然如此，为什么人们又要逃避自由呢？逃避自由的原因与途径又是什么呢？这正是本书所要回答的问题。

西方最知名的人道主义哲学家、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埃里希·弗罗姆和他的《逃避自由》，至今还不能说已为我国广大读者所熟知，但在西方世界却曾是风靡一时的名人名著，一些青年对它甚至达到了顶礼膜拜的程度。被誉为二十世纪最出色的社会学著作的《逃避自由》一书，是确定作者毕生研究方向——社会心理学（将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综合”考察）的奠基之作，尔后大量著作的许多主要观点基本上没有超出此书的范围。该书自1941年初版之后，迅疾不胫而走、广为流传，仅止1961年这21年中，就出了22版之多，平均不到一年就要再版一次，其畅销程度可见一斑。

作为社会心理学家的弗罗姆，从心理分析角度提出，人类的全部活动都取决于两种心理需要，一种是人与同类交往以逃避孤独，一种是对自由的需求以排除其“个性化”发展和“内在成长潜能”的障碍。如果人与同类的交往、对自由

的需求同时满足，人就能使自己与自然界、他人有机和谐地结合在一起，这是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因而是人们所追求的自由——追求自由。

与追求自由相对的逃避自由，又从何说起呢？原来，在人的成长过程中，由于切断了与母体、他人的联系，因而缺乏先前的相与感、安全感，日趋孤独，甚而导至个人放弃其独立自由的倾向，而希望与自己不相干的某人或某事结合起来，以便获得他所缺乏的力量，这种放弃独立自由的倾向就是逃避自由。犹如一个经常忙得晕头转向的人企求喘息的机会，但一旦真的退休、长病假、天天在家、无所事事的时候，又会闲得发慌，甚至生出许多无端的烦恼来，因此又希望做些事情一样。

资本主义社会结构对人的心理产生了双重影响，从而形成了自由的双重意义。这个社会中的自由又意味着不自由，从积极意义上的自由到消极意义上的自由，从追求自由到逃避自由，客观上就接触了人的异化现象的某些本质特征。由于垄断资本的高度集中，经济体制的某些方面限制了个人创造的成功，摧毁了许多人经济上的独立，增加了人们的惶恐不安感和无能为力感。奎

断资本产生的大批白领工人，成了庞大经济机器上时大时小的齿轮、成千上万个螺丝钉。他们各操一项高度专业化的技艺，与大量地位相似的同类残酷竞争。这部机器飞快运转，令人眼花缭乱、应接不暇，无法控制自己，一旦落后就受尽种种磨难。这种景况不仅大量表现在经济生活中，而且政治、文化领域也概莫能外，甚至影剧院的掌声、宴请中的干杯也无法逃脱这种规律的制约，这不能不说是资本主义自由的一幅浮世绘。

为了去除孤独、不安全感，弗罗姆从心理机制角度分析了逃避自由的三种方式：对孤独的克制、对世界的憎恨和使个性的丧失——现代资本主义社会中大多数人所采取的逃避途径，使个人不再是个人，他完全采纳了文化模式给他所提供的那种个性形式，使他完全和他人一样、成为他人所希望的那个样子。这样，“我”和世界之间的差别消失了，孤独感、无力感也消失了。这种逃避方式犹如动物的保护色，看起来它与周围环境是如此相似，以致很难从中辨别出来。个人放弃了个人的自我，成为麻木不仁、机械动作的人，不再感到孤独、忧虑和烦恼，然而却付出了高昂的代价——他失去了个人的自我。

这一节，似乎也可以作为对法兰克福学派另一代表人物马尔库塞所谓西方世界那种“物质丰富、精神痛苦”、“痛苦中的幸福生活”的若干反思了。

在对马克思主义、弗洛伊德主义的研究、“综合”中阐发的，关于人的存在、本性、异化与解放的理论是弗罗姆学说的核心。一方面，对以《1844年经济学哲学手稿》为代表作的马克思早期思想、异化理论，弗罗姆进行过认真的研究，认为马克思的异化劳动思想具有合理因素，但过分强调经济、政治因素；马克思虽然提出了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概念及其关系，但并未说明两者是如何实现转化的。另一方面，在法兰克福学派中，弗罗姆受弗洛伊德的影响最深，他认为弗洛伊德的功绩在于发现人的“无意识”现象，但这一发现尚未得到充分的科学论证、并且容易被人误解，必须加以完善。因此，他说“我也试图找出弗洛伊德学说中那些仍然闪烁着真理光辉的思想和那些需要修正的论断。对于马克思的理论，我也是这么做的。在理解和批评这两位思想家后，我最终达到了一种综合。”他认为把“怀疑一切”作为自己理论的出发点、相信真理

的力量、强调人道主义并运用辩证的动力学研究法等四个共同点是实现两者“综合”的基础。他用弗洛伊德的“无意识”、“性格”理论来补充，提出了“社会无意识”、“社会性格”这两个概念，作为联结经济基础与上层建筑的纽带，并算是实现了两者的“综合”。

弗罗姆认为，对于人的基本社会需要的理解，是理解人类自身的基础。人的本性就是人的本质，这种本质不是抽象、先验、静止、外在的，而是在自我活动、自我能动性、改造客观世界的实践活动中表现出来的。他承认私有制是人性异化的原因，并引用马克思手稿说“私有财产使我们变得如此愚蠢而片面”，“为了使属于人的存在物能够从自身产生自己的内在财富，必须使他沦落到怎样一种绝对贫困啊！”但他在解释工人阶级解放的含义时指出，有些人以为马克思希望废除私有财产以改善工人阶级的地位、获得更多财富，这是一种曲解，不是马克思的最终目的。最终目的是使异化劳动变成自由劳动，把人从终身埋没在一个职业的专门化的畸形中解放出来。

弗罗姆的人的学说在一般理论形式上提出了一切形式的异化实质上是人性的异化，而且他把

劳动异化和人性异化联系起来考察，这样来理解人的解放问题，在一定意义上反映了资本主义社会的某些实际情况。他在一定程度上看到了人的自我能动性即社会性，但没有深入到阶级性；他只看到人和自然的对抗，没有看到在和自然的对抗中结成的生产关系、阶级关系——人与人之间的对抗、阶级的对抗，这是人性异化的最重要原因。尤其错误的是，他后来用弗洛伊德的生物主义、心理主义来考察人，从心理、意识本身去寻求人性异化的原因，否定了人性异化的经济根源、阶级根源，进而否定无产阶级进行革命的必要性，这不能不说是一种历史的倒退了。

埃里希·弗罗姆（Erich Fromm 1900—1980），出生于德国法兰克福的一个犹太人家庭。母亲整天抑郁寡欢、情绪低落。父亲是性情暴躁、喜怒无常，只知为赚钱而活着的商人。这个家庭对作者产生了深刻的影响，1980年3月18日弗罗姆在瑞士洛迦去世前的最后一次谈话中说：“于是，我就变成了一个孤独的孩子。我一直期待着什么东西能把我从这种孤独中拯救出来。”“我之所以着手心理学的研究，恐怕是当

时我变得越来越神经质的缘故。在那样谨小慎微的父母身边我没有发疯，这就要感谢上帝和归功于其他方面对我的影响了。”父母的神经质、美丽女友的自杀、二次大战法西斯主义、纳粹德国的疯狂，使作者深感孤独、苦闷，陷于沉思之中，不断寻求解脱与答案：这一切到底为什么？又是怎么造成的？——“我要认识支配个人生活的规律和社会规律，也就是人在社会生存中的规律。”找来找去，找到了两个犹太人：一个马克思，一个弗洛伊德。马克思重宏观、社会、重经济、阶级的分析；弗洛伊德重微观、个人、重生理、心理的分析，弗罗姆便试图把二者“综合”起来。

1922年弗罗姆获德国海德堡大学哲学博士学位，曾在慕尼黑大学和柏林精神分析研究所工作，1934年离开纳粹德国时已是声望很高的心理学家了。去美国后曾在芝加哥心理分析学院、耶鲁大学、哥伦比亚大学等任教，成为美国新弗洛伊德主义创始人。他一生著述丰富，在他的几十部著作中，《逃避自由》、《爱的艺术》、《马克思关于人的概念》、《在幻想锁链的彼岸》、《要财富还是要生存》等最为重要。《逃避自由》在弗罗姆全部著作中的重要地位如前所

述。《在幻想锁链的彼岸》则是作者“综合”马克思主义与弗洛伊德主义的纲领性著作。

本书是译者和洪林先生友谊合作的结晶，他停下手头工作、校阅了全部译稿，于海同志译了其中第六章，姚远小姐、晓岩同志对于出版事宜多所关心支持，在此一并志谢。

陈学明（薛民）

1987年仲夏识于复旦大学

前 言

本书是关于现代人性格结构、心理与社会因素间相互影响问题之总体研究的一个组成部分。这两个问题我已研究多年，看来还需相当长一段时间，才能初见端倪。如今政治局势的发展及其对现代文化的最大成就——尊重人格和个性所造成的威胁，使我下决心中断原来规模宏大的研究，而集中探讨其中一个与当今文化和社会危机直接有关的问题——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要充分解释自由对现代人的意义，必须首先分析现代人的整个性格结构，只有把后者向读者交待清楚了，才能使他们透彻

地理解前者。但事实上，对于人的性格结构，我在这里只是经常地提到某些概念和结论，并没有象作总体研究时那样给予详尽的诠释。对于其它一些非常重要的问题我也常常只是一笔带过，有的甚至根本没有涉及。我认为，心理学家的当务之急是毫不延迟地对分析当前的危机作出自己的理论贡献，哪怕这样做会打乱自己的总体研究计划。

在我看来，强调从心理学角度考察目前局势的重要性，并不意味着过高估计心理学的作用。社会过程的基本单位是个人，是个人的欲求和恐惧、个人的激情与理性、个人的乐善好施和心毒手辣。要考察社会的动态过程，得先剖析个人心理的动态过程，这正象要鉴识个人，得先把个人放到造就他的文化背景中探究一样。本书所阐述的中心内容是：摆脱了既保护人又限制人的前个人主义社会的枷锁的现代人，并没有获得能使他的个人自我得以实现，即他的智力、感情和感官方面的潜力得以发挥这一意义上的积极自由。自由给人带来了独立和理性，但同时又使人陷于孤独、充满忧虑、软弱无力。这种孤独是人所难于忍受的。摆在人面前的道路只有两条：一是逃避

自由的不堪忍受的负担，重新去依赖、屈从他人；二是进一步去争取建立在尊重个性、把人置于至高无上地位这一基础上的积极自由。虽然本书只是一种诊断而不是预言，只是一种分析而不是决策，但它也为我们的行动指出了一个方向。晓达由自由民主制度沦为极权主义制度的原因，是以实际行动战胜极权主义力量的基本前提。

本书写作过程中得到了许多朋友、同事和学生的鼓励与建设性的批评，对此恕不一一致谢。读者将在脚注中看到，拙著的许多观点参考了一些著作家的思想，在此一并表示感激之心。对于那些为本书的出版直接作出贡献的人们我更永志不忘。他们中的伊丽莎白·布朗小姐，就总体结构提出了许多宝贵的建议；T·伍德豪斯先生，帮助我整理手稿；A·塞德曼医生，就有关哲学问题曾多所赐教。

承蒙下述出版单位的特许，使我得以大量引用它们的出版物：基督教教育委员会，费城：《基督教的基本原理》，J·加尔文著，J·艾伦译；哥伦比亚大学出版社，纽约：《社会改革和宗教改革》，J·S·夏皮罗著；W·B·伊登斯出版公司，密歇根：《意志的束缚》，马丁·路

德著，H·科尔译；约翰·默里，伦敦：《宗教与资本主义的兴起》，R·H·托尼著；赫斯特和布莱克特，伦敦：《我的奋斗》，希特勒著；艾伦和昂温，伦敦：《意大利文艺复兴时期的文化》，J·布克哈特著。

埃里希·弗罗姆

1941年